# 威爾杜蘭九十歲

朱約農

威爾杜蘭（Will Durant）到十一月五日滿九十歲。

這本非什麼了不起的事。長壽在今日，就像短命之在往日，是件普通的事。本來，貧乏的「長」，不如充沛的「短」。「長」而又充沛，那就比較稀有，而且可貴。

杜蘭開始的時候，沒有想到會有今日。當初，他祇是一個普通的讀書人，少有才智，帶有若干創作慾。

改變他整個人生的，當然是一九二六年出版的「哲學的故事」一書，那時他已四十一歲。那是一本通俗而有內容的書，毫不故弄玄虛，敍述少數重要西洋哲學家的生平和思想。但它打動了許多厭惡學究和學閥的人的心，因而大大地轟動起來，成爲哲學書中第一本暢銷書。（在美國，四十年來銷行了四百萬册；在世界各地，它譯成了十七種語文的版本。）

這大大地鼓勵了杜蘭和他的同道與夫人艾麗兒。利用這筆豐厚的版稅，他們便着手撰寫同樣通俗的世界文明史，謙稱「文明的故事。」（中國的譯本稱爲「世界文明史」。）

他們知道，這樣長篇累牘的歷史書，決不可能會像「哲學的故事」那樣風靡一時；但他們的用意，祇想貫澈歷史通俗化的用意。

一九三五年，在工作約七年之後，文化史的第一集（「東方的遺產」）出版了。一般的反應是「平淡」和許多的譏評，而大部份的指摘，都來自美國的學術界。

杜蘭夫婦對這些評論，已有事先的準備，他們應該要做的，祇是繼續努力。差不多每隔四年，他們出版一集，一直到一九六七年出版了第十集（「盧騷與法國革命」），才結束全部的工程，前後共歷四十年。

那時候，杜蘭八十二歲，艾麗兒也已六十九歲。

他們原未料到會在有生之年完成這部鉅著，更想不到完成之日，還留得一個相當強勁的軀體和始終機敏的心智。當然，兩老在表面上是鶴髮童顏，但從近鏡頭的彩色照片中，可清晰看出他們滿臉的縐紋，和不可掩飾的老態。

**歷史從他們筆下重現，但生命却從勞苦中逝去。**

誠如杜蘭自稱：「歷史無非是生物的片斷。」言下之意，是說**歷史中的人性佔少數，獸性佔多數。在物質世界中，人在顯著的進步；但在精神世界中，人的進步，實在十分的細微。即使是物質上的進步，其意義還值得深加檢討。**

爲了檢討這一意義，杜蘭夫婦在退休後復出，回到他們在洛杉磯的工作室，着手撰寫文明史的第十一集（「拿破崙的時代」），而且預定在杜蘭九十歲的這個月中出版。

杜蘭夫婦在幾年前着手撰寫的兩人聯合傳記，本來準備在年內截稿付梓的，現在也因爲「拿破崙的時代」而告延期。他們目前的情緒，大有「來日方長，要自傳何爲」之慨，說不定在「拿」集之後，還將繼續寫「希特勒時代」或「邱吉爾時代」哩。

何況寫自傳對他們兩人而言，祇是消磨時日。縱然他們之中有一人先去，另一人也能續完它。何況最長的自傳，也能短寫；就像整個人類史，也能用三數字概括一樣。

對一般人而言，值得追憶的，倒是杜蘭夫婦的持久恩情。他們本來是師生之誼。杜蘭在紐約弗瑞爾中學任教時遇見艾麗兒，她是出生于俄國的一個女孩兒，說話時略帶俄羅斯的鄉音。

一九一三年，爲了要娶她，杜蘭辭去教席，以杜絕外界的批評。當時，他廿八歲，她十五歲。

十五歲的小姑娘，赴婚時，頭頸裏還掛着一雙溜冰鞋。這倒並不是說艾麗兒是一個溜冰迷，而是因爲窮得無錢雇車前往市政廳的公證處，祇能憑她那股溜冰的技術，趕上幾英里的路程，免誤佳期。

就因爲這種精神，她得了「艾麗兒」這個美名。她原先的閨名，叫做艾達•考芙曼。「艾麗兒」本是莎翁名劇「暴風雨」中那個頑皮的幽魂，杜蘭在早年（一九二七年）寫一本小說（稱爲"Transition"）時，就把它賜給了書中的考芙曼，從此一直用到現在。

堅强勇毅是「暴風雨」中那個艾麗兒的本性，現在也成爲原名考芙曼的艾麗兒的本性。從「哲學的故事」開始，艾麗兒便參與杜蘭的著作生涯。在文明史的四十年漫長歲月中，艾麗兒首先擔任搜集資料和分析研究的工作，後來兼充顧問，最後直接參與寫作。

在制訂綱要時，或在撰稿途中，性格內向的杜蘭不免和外向的艾麗兒發生衝突，引起激烈的爭辯，但事後總能折衷求致一個妥善的結論。

看杜蘭把「哲學的故事」一書獻給艾麗兒這一事實，讀者就知道他對她的感激之情。特別要瞭解的是：當年該書出版時，杜蘭還無籍籍之名。他如此做，眞是出乎至誠。

後來「文明的故事」陸續出版了，書面上一直頂着杜蘭一個人的姓名，但艾麗兒對那些書的貢獻，恒在五成左右。到了第七集（「理性的肇始」）出版時，杜蘭堅持把艾麗兒的名字也連同刋上，從此任何杜蘭出版的書，都脫不了艾麗兒的聯名，以迄文明史的第十集（「盧騷與法國革命」），無不如此。

除了艾麗兒，杜蘭的唯一愛女艾漱兒和領養的獨子路易，也參與了這一艱鉅的工作。這些書幾乎都在洛杉磯的杜蘭寓所中完成。

他們大致每天工作八小時至十二小時，每週七天，連續工作了四十年才告一段落。「文明的故事」原先的計劃，祇有五集，後來在「欲罷不能」的情況中擴展到十集。據說：八、九、十三集原是一集，由于原料泛濫，不忍犧牲，而索性寫成了三集。這說明杜蘭夫婦對細節的愛好，有「不厭其詳」的癖好，也因此招來許多的惡評。

據杜蘭夫婦自稱：每集文明史的資料，平均來自五百部「書籍和典籍」。換言之，他們必須詳讀那麼多的東西，才能滿足他們寫一本書的需求。

通常的程序，是由杜蘭和艾麗兒就同一主題同時擬訂綱要，然後求得統一的觀點，由杜蘭用原子筆一字一字地寫下，撰擬第一次草稿，經一次或多次的修正後，成爲定稿。

那時候，艾漱兒和路易便負責打字謄清，給以適當標點符號和章節的分類和附圖。但在送往出版商的編輯部後，也會在內容上發生異議，那時候路易便擔任中間的聯繫工作，協調兩方的意見，達成最後的定稿。

在「文明的故事」一書中，讀者不難發現杜蘭夫婦的歷史觀，充滿着開明的人生。透過這些開明的人生，出現了人類文化的績效。

這種近乎感性的歷史觀，一向是知性歷史學家的批評對象。但杜蘭夫婦一直堅持他們的

「成見」，未爲外界的評議改變他們的立場。

過去英國的威爾斯（H. G. Wells）和美國的房龍（Hendrik Willem Van Loon）用通俗方法撰寫歷史地理時，歐美的學術界也曾有過坐立不安的表情，認爲通俗作家把知識的世界，攪得天下大亂，罪無可逭。

杜蘭的書裏，確有許多史實與衆不同。學術界批評得最嚴厲的，是說杜蘭往往在全然錯誤的假設或前題下，製造全然錯誤的結論。杜蘭對此都沒有反駁。

其實，越是古老的史實，越沒有原始資料可資憑藉，正確性自然有問題。就是認爲可靠的考古發現，也有許多在埋葬時作僞的。

這就是所謂獸性紀錄混淆人性紀錄的一種表現，也因而產生了考據學家，產生了鑑定學家，產生了「再」鑑定的方術，產生了眞眞假假的爭論……最後，就產生了「學術」。

杜蘭夫婦在結束文明史後寫的「歷史的教訓」一書中，雖然沒有說得那麼坦率，但他們對歷史教訓的眞意義，並沒有太肯定的「肯定」，那是顯而易見的。

他們祇是說：「研究歷史的人不會悲傷哀痛，因爲他們認爲，人生的意義端在各人自己從生活中去創造。我們應以使生活具有意義爲樂，而且使它永垂不朽。」

所以，在歷史背景中，人生的意義端在個人的心中。那麼，在歷史背景中，國家社會的意義又是不是端在國家社會本身的奮鬪中？

關于美國以及它的前途，杜蘭是憂喜參半。首先，美國幾乎是一個沒有歷史的國家，它今日豐厚的物質成就，完全是取自世界各地的文化遺產而達成的。它的先民，雖在苦難中求得獨立，但他們生長的廣大國土與其優越的氣候和土壤，却是從紅人手中劫掠來的。

美國先民的寬宏大量和美利堅的特有理想與精神，却在短短的兩百年中，從滿懷壯志、

成功、富有、浪漫、盛氣、驕傲……中漸漸消失，到今日，形成一個富裕而墮落的西方文明。

杜蘭的生物學觀點，到了這裏，大有難以適用之苦。如果說美國目前還在它的青春文化階段，則它今日所面臨的困境，無異說明它是一個不中用的青年，一個懦怯沒有鬪志的青年，將來有沒有它的中年和老年，那就大有問題。

如果說目前的美國已進入它的中年文化期，那無異說美國的青春是短暫的、快速耗損的……那又何能期望有一個久長的中年和老年呢？

如果說目前的美國已進入它的暮年，這個假設不是更可怕了嗎？

杜蘭談到美國的時候，經常如履薄冰，不敢放言高論。他從不敢說美國的文化會「獨步世界」，但他又不同意美國會走羅馬帝國滅亡的路，因爲兩者的內涵和世界環境迥異。

當然他不能否認：任何集體文化必有一個生物學的歷程：即誕生、成長、和死亡。杜蘭曾經表示：萬一美國的衰落跟羅馬帝國有相似之處，他希望美國也能像羅馬帝國那樣：從巔峯下坡，以至它的滅亡，能走上三、四百年的時間。

這些遠景很使杜蘭夫婦沮喪，他們在一九六七年結束文明史之後，暗中合作寫了一本「西洋現代文學巡禮」，而于一九七〇年出版（中譯本由晨鐘出版，易名為「廿世紀文豪看人生」），他們寫的，除福克納、海明威、詩人龐德、艾略特之外，還詳述了存在主義的幾頁大將，如沙特、齊克果、海德格等人；最後，還分析了現代的幾個蘇俄文人：如索忍尼辛、巴斯特納克、和詩人葉多盛科等。

這就是在歷史的窒息下，杜蘭夫婦藉以舒暢心胸的一本書。